

国际知名学者和专家谈中国经济改革

郭 树 清

九月上旬在我国召开了一次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一批国际知名的宏观经济理论 and 实际方面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并与中国同事们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外国代表们尽管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思想理论背景，但是在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上却取得了出乎预料的一致。原籍波兰的著名经济学家布鲁斯教授评论说，这种情况在通常的国际学术会议中是极为罕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托宾也说，这是他与英国的凯恩克罗斯爵士和西德的埃明格尔先生合作得最好的一次。

这次讨论会自始至终保持紧张、严肃的学术气氛，代表除在正式会议上争相发言之外，还在休息时间（包括进餐时间）进行了广泛的个别交谈。来宾们对我国的经济改革发表了热情诚恳的评论、意见和建议。

中国的变化：独特的改革具有世界意义

不论是来自东方还是来自西方的学者们都高度评价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认为这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件大事。如果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成功，必将对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生巨大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将为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宝贵的经验。来宾们认为，中国的改革应当而且也正在走向一种微观充满活力和宏观有效调控相结合的新经济模式，而这一目标在东欧国家中，即使是改革取得较大成就的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迄今为止还远没有完全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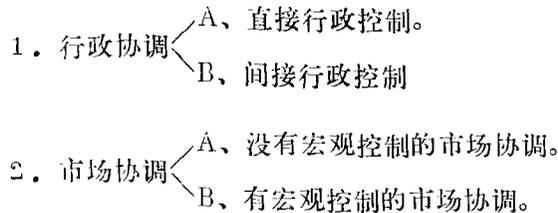
对西方经济体制有着深刻的切身体验的经济学家们，反复强调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定要吸取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教训。他们特别指出，在保持微观的自由竞争活力的同时，达到宏观平衡和社会公平方面，中国有条件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西方经济模式的发展和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的演变过程中，对于一系列应当而且能够避免的问题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从而造成了现在面临的种种困难。中国不应该照抄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经验，相反，应该走出一条独特的新道路。

目标模式——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

与会代表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讨论了中国经济改革应当选择的目标模式。

中国经济学家对股份经济问题发表的意见，局部地反映了这一讨论。与上面的一个问题相联系，我以为股份化对国有企业来说在短期内，比如五年内，可能还不是解决问题的主要办法。也许我们还是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在国有企业实现所有同经营的初步分离，第二步再考虑所有同经营的彻底分离。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科尔内教授首先就此做了较为系统的发言。他把一切现实的经济体制划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行政协调，另一种是市场协调。行政协调的特点是，在上下级机构之间存在着纵向的信息流，存在着所属与从属关系，决策集中化。市场协调的特点是，在买方与卖方之间存在着横向的信息流，二者处于同一层次，不存在所属与从属的关系，决策也是非集中化的。这两大类型又各有两种较为具体的形态。用图表示如下：



上述四种模式无疑都是理论抽象，现实的经济体制总是某种混合形态，但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模式必然是一种。

1 A 与 1 B 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纵向的行政控制，但是纵向调节的手段却有所不同。在 1 A 中，上级行政机构以具体的指令性生产指标和投入限额下达命令；而在 1 B 中，上级行政机构不再下达命令，它们手中掌握有一套“经济杠杆”，通过这些杠杆来调节下级机构的行为，最终调节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1 A 就是典型的传统体制，而 1 B 则是传统体制的一种改良或修正。2 A 与 2 B 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前者缺乏宏观控制机制，而后者则存在着非行政手段的宏观控制。

科尔内教授认为，改革传统的直接行政控制，很可能首先走到 1 B 或 2 B 这两种模式，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入了 2 B 模式。如果说改革的最后目标是 2 B，而 1 B 仅只是某种过渡形态，那么，1 B 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从匈牙利的经验来看，如果基本上进入 1 B 模式，那么客观上会有许多因素发挥作用，以使这种模式长期化、固定化。但是，理想的目标模式只能是 2 B 而不是 1 B，因为现实生活已经证明，1 B 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1 A 的弊病和困难。

其他与会外国学者在原则上一致肯定了科尔内教授的意见，认为中国改革的目标应当选择类似于 2 B 的模式，但是，他们又补充了一些重要的论点。

布鲁斯教授特别提到了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经济改革一定要建立起中间金融机构，以期形成一个资本市场。这样的资本市场可以组织企业和部门之间横向的资金流动，投资资金的大部分要通过资金市场。第二，所有制必须多样化。多样化不仅指包括有集体、个体经济，也包括国有经济的多种形式，例如联合股份经济。第三、国家应保持对下述三个领域的强有力的控制：（1）投资过程。国家不应当是唯一的最重要的投资者，但应发挥充分的积极作用，以控制未来生产能力的结构；（2）收入分配。有效的收入政策应能达到两种目的，一是形成明确的社会收入的构成图式，二是使实际产出接近于可能的产出水平，达到合理的充分就业。（3）对外经济关系。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垄断对外贸易，但是一定要保证使国外的经济变动通过国家的中介引入到国内经济中来，特别是中国这样的经济，不应当经常处于受外部影响而发生波动的状况。

来宾中年纪最轻的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琼斯先生，发表了很为独特的见解。他的意

见受到托宾教授等人的重视。琼斯教授说，从理论上说，中国的改革应当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既包括商品、劳动市场，又包括资金、外汇市场。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恐怕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经济不应完全开放资金市场和外汇市场。其原因在于：（1）政治上的考虑；（2）经济结构的问题；（3）信息不灵通；（4）通货膨胀的威胁；（5）经济决策中酌情处理的必要性。由于上述互相联系的原因，如果资金流动完全是由供求决定的利率来调节，恐怕很难保证资金流向效益最好的地方。发展中国家之间，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作用存在很大差别。在发达国家，如果要使需求降低2%，只要改变一点利率就够了，但在不发达国家，如果使用同样的手段，那么强度就需要是四倍或更多。在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是重要的调节手段，但在不发达国家只有很少一部分个人才会对所得税作出反应。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应当形成开放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而在资金和外汇方面，直接的数量控制仍将是必要的，这二者并不矛盾。由国家的中央机构直接控制贷款的发放，看来存在很大的困难，因为中国的企业数量太多，究竟通过什么机构采取什么办法来管理贷款，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方法与步骤——改革能否设计、分阶段与“一揽子”

改革可以而且需要设计。来访的学者们认为，首先必须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目标蓝图，舍此无从设想行动的步骤。但是目标的描绘不应该也不可能一开始就搞得很细，需要在实践中补充完善。科尔内教授风趣地说，关于目标的设计只需要几页纸就够了。

经济改革是逐步前进还是一次解决问题？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后者是不可取的。布鲁斯教授说，过去在对东欧改革进行总结的时候，他们得出一个结论，非一次性的彻底改革不能解决问题，这就是他所主张的“一揽子”改革的意思。但是，从1980年以来，他对中国的情况进行的研究却使他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存在着许多比1A还落后的因素，因此，中国的改革只能循序渐进。

但是，科尔内教授对“一揽子”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他说，“一揽子”办法并不等于一次解决问题，而是指多方面的配合。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学者经常所说的配套改革。他分析，经济改革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可以每日每时进行的改革（例如所有制形式方面），另一种则必须是一次又一次的配合行动，后者就是“一揽子”改革。科尔内反复强调说，象价格改革，很难设想不同时进行税收、工资、利率等等方面的改革和调整。对此，布鲁斯教授也持同样的看法。

改革的步骤或阶段很难作精确的设计，外国朋友们说，这是中国同行才能完成的工作。但是来宾们的发言从原则上肯定了赵总理在接见他们时提出的设想：首先要形成商品市场，然后再开放劳动市场和资金市场。托宾教授说，中国今后将会逐渐感到需要一个资本市场，即银行之外的资金市场。但是，现在不要急急忙忙地过分热心地考虑这个问题，更不必简单地模仿西方。在此期间，虽然中国没有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但仍然有能力来发展宏观控制，进行经济改革。但是，银行系统的改革却应早日着手进行。西德前联邦银行行长埃明格尔先生认为，开放股票市场对中国来说，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可能是不现实的。但是，可以先考虑建立起国家控制的债券市场，特别是国债市场，因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最好办法不是以银行透支而是要发行国债，这是很紧迫的问题。

与市场的建立和开放紧密相关的问题是直接控制的取消。曾任英国首相经济顾问的凯恩克罗斯教授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英国战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逐步完成的。他说我们首先放弃的是商品价格管制和物资分配，然后放弃的是劳动就业分配，最后才放弃对外汇的管制。当然，放弃行政管制不等于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托宾教授和布鲁斯教授在各自的发言中都肯定了这些经验对中国改革有一定意义。

当中国学者问到微观改革与宏观改革能否在时间上分开进行时，外国同事们都持坚决的否定态度。

双重价格与分块解决问题——合理性与限度。

布鲁斯教授对双重价格很感兴趣。他说，生产资料的双重价格（即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是中国的一个发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过消费品双重价格的经验，即对同一种消费品实行配给价格和商业价格，二者水平不同。但是两种价格都是国家控制的。中国在生产资料领域也推行了双重价格，而且计划外部分国家不再控制，目的在于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这种做法看来是有效的，但也产生了一系列必然会产生出的问题。布鲁斯的结论是：双重价格是有用的办法，是一种桥梁，但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不能存在太久。

几乎所有的外国客人都怀疑把双重价格保持很久的做法。在他们看来，这个问题应该而且可以在近几年内解决。尽管没有人提出确切的时间限制。但是有些方面的改革却不能拖延，拖延下去，后果会很不利，价格改革就是这样。

关于价格改革中按农产品和工业品，或消费品和生产资料来分块解决，还是以整个价格体系的同步变动来进行，多数人主张要考虑连锁效应，不能使分块的界限太固定。中国的改革是先从农产品、消费品开始的，工业生产资料大大落后，这种情况是独特的。科尔内教授经常强调各种产品之间价格的紧密联系，认为分产品分块调改价格弊病很大。多数经济学家同意这样的做法，即对不同产品价格控制的放松，应当以其市场供求的平衡程度为根据。

经济“过热”弊大于利——存在内在机制

国外学者一致认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存在着一种严重“过热”状况。信贷过分扩大，重要原料、能源和交通出现短缺和紧张，导致许多产品国家牌价和市场价格之间差额巨大。经济“过热”的另一个表现是国际收支的急剧恶化。最令人不安的现象还表现在出现了工资物价的螺旋形上升，二者互相作用，交替上升，各个企业又攀比效尤，增发工资。大多数国家的经验是，这类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一旦听其存在下去，就很难加以制止。

多数外国学者对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感到难以理解。科尔内教授就此做了专门的发言。他说，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着系统化的强迫化的增长。经济过热、增长过高是反复出现的现象，这既有数量扩张，又有投资饥饿。增长越快，越想更快，最后事与愿违。这种情况在匈牙利、在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都有许多教训。为此，科尔内说，他要满怀敬意地提出一个警告：过高的增长是有危险的。

科尔内教授列举了五种危险：（1）通货膨胀。一些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也许需要有一种通货膨胀使人们从梦中醒过来。但社会主义国家早已醒过来了，这样做等于给失

眠者喝大量咖啡。(2) 加剧短缺。中国的商品供应近几年大为改善,特别是食品。但是总的讲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短缺经济,例如能源、原材料、建筑材料、耐用消费品、民用住宅等等供求差别很大。(3) 改革倒退。过高的增长造成多方面的不协调,很可能导致一个与改革相反的结果,重新来一个权力集中。(4) 很可能使真正的消费削减。经济过热,投资项目太多,工期延长,造价提高,需求过强,产品质量下降,最后不得不牺牲消费。(5) 加剧部门不平衡。一些部门跑得太快,一些部门却越来越落后,比例关系恶化,结构不合理加剧。

来自西方国家的代表,与其说对增长速度敏感,不如说对过度需求更重视。他们感到目前经济状况的不良之处,是存在着很大的过度需求。凯恩克劳斯爵士和埃明格尔先生尖锐指出,在存在着过度需求的情况下,任何改革都很难实行。美国的托宾教授,开始时对中国人担心投资规模过大很不以为然。他说,投资多有什么不好?也许这是在美国那种长期的需求不足、投资不足的环境中生活所造成的印象。但是在听了科尔内教授和布鲁斯教授的分析之后,托宾先生很有感触。他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明确表示,中国必须控制信贷,必要时直接控制投资。他认为中国当前应同时实行紧财政和紧货币政策。

改革中要保持经济稳定——在经济手段不成熟时要毫不犹豫地使用行政手段

凯恩克劳斯教授为会议提交的论文是关于英国战后经济转轨问题的研究成果。文中特别强调转轨期间财政政策是最重要的控制手段。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经济对货币政策和利率的反应尚不敏感。中国目前的状况与当时的英国相比,对经济政策的敏感程度无疑更低,其提高过程也必然更为缓慢。

为保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改革初期仍然需要保留相当一部分直接控制,特别是对银行贷款的控制。托宾教授说,既然中国的企业对利率的反应很迟钝,那就只能维持贷款指标或限额。信贷总规模控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应该取消。其他学者还提到控制工资(包括奖金)总额的问题。但托宾教授认为,最好是控制工资的相对平均水平,而不是总额。

布鲁斯教授谈到改革中的宏观控制时,提出一种设想,即一般说来要先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如果这些手段不能成功,那么可以再使用行政手段。为达到经济目标,不同的部门可以在不同的时期使用不同的手段。一些部门很可能在一定时期内仍需保留传统的手段,不能排除在中国的经济中,基础部门(例如原料、燃料)的直接控制要保留较长时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一种危险,那些临时性的办法往往容易变成永久性的办法,这要尽力防止。

托宾教授的设想有所不同,他认为可以考虑在保留直接控制办法的同时,开始运用间接控制办法,这就是某种双重性控制,以后逐步减少直接控制,加强间接控制。例如中央银行在保留信贷指标管理的同时,就可以建立和运用储备金制度,等等。

喘息时机与不停顿的改革——当前应做的事情。

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前一阶段的改革在微观放活的同时,宏观控制的加强没有跟上,换句话说,有些管制在取消它们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时就过早地取消了。因此,正如托宾教授所说,目前需要一个喘息时机。但是所谓喘息时机,并不意味着要使改革停顿

下来，而是要加紧宏观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使间接控制体系建立和完善的步伐跟上改革形势的需要。

综合各位学者专家的意见，在加强宏观控制方面应做好以下工作：（1）加紧设计银行体系，为建立真正的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制度准备条件。增强信贷约束，贷款必须按期还本付息。调整利率结构，控制住贷款增长规模。（2）重新加强对外贸外汇的行政控制。用间接的办法来控制外贸，建立一个均衡的汇率是必要的，但现在的条件还不具备。一定要严格控制进口、保证出口，不能放弃国家对引进外国资本的集中管理。

（3）加强对工资水平的控制，已制定的奖金税、工资税政策一定要坚决保证实行。工资增长的速度必须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如果现在控制不住工资，将来就更控制不住。（4）一定要建立起强有力的监督检查体系，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审计机构。审计机构不一定全是国家机构，应当发展某种社会审计组织。（5）对统计、会计、市场预测等信息部门要给予高度重视，没有及时准确的经济信息，宏观控制就谈不上。

改革需要巨大的耐心、勇气——重新回到集权体制的可能性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遇到种种困难和阻力。布鲁斯教授分析，这些困难和阻力来自多方面，既有经济方面的传统因素，也有社会、文化、政治方面的因素。东欧各国的改革中，都经常出现某些社会力量来阻碍改革。因此，改革要取得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

科尔内说，中国现在的改革势头很好，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改革不可能是一个平稳的过程，很可能出现反复和逆转。原因在于：（1）经济体制是相当复杂的，改革过程中一旦出现大的失误，就会导致经济生活的紊乱。当一个经济发生困难时，最好的办法是用行政手段来解决。（2）短期困难几乎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出现这种困难时，为稳定经济而采取某些临时性的行政控制手段也是应当的。但千万不能因此放弃长期目标。（3）政府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是很难改造的。因为所谓行政管理机构就意味着掌握着集中的权力，要让它们交出权力是相当困难的。要克服困难，避免倒退，最重要的是领导人的决心和意志。

凯恩克劳斯教授、白特教授、埃明格尔先生，特别强调一个现实的危险，这就是改革的愿望和通货膨胀的压力之间尖锐的矛盾。如果不能采取严格措施压缩过度需求，改革继续深入的风险是很大的。

但是尽管如此，来访的学者和专家们对中国的改革抱有极大的希望。正如托宾教授所说，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有理由犯错误，但是中国是一张白纸，完全可以画出最美丽的画图，因此对中国也应比对任何国家更有信心。

* * *